

學術界成為反烏托邦的工作場域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鑑於阿德里安娜·凱澤 (Adrianna Kezar) 在其出版作品 *The Gig Academy: Mapping Labor in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出版) 中對學術界的評價極其負面，但令人驚訝的是，她仍然對學術界的改革抱持樂觀態度，儘管知道改變並非一蹴可及。

凱澤時任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高等教育教授，她在辦公室裡透過電話表示：「我對於學術界的改變以及改變需要多少時間的看法很實際。」她和同事湯姆·德波拉 (Tom DePaola) 和丹尼爾·史考特 (Daniel T. Scott) 引用他們自己和其他人的大量研究成果，詳細闡述了他們認為學術界的勞動實踐如何危及高等教育的目標。

他們寫道：「我們正在迅速逼近一種制度上的反烏托邦，這種反烏托邦是人們長期以來一直擔心的，人們認為，大學是我們堅守自由探索和高等教育民主功能的唯一堡壘。」

他們痛惜學術界所提供的職缺無法滿足教職員日常生活開銷或不具有職業發展前景，更別提共享治理的願景了。他們也擔心學術界裡職位的快速變化，從全職、終身職到臨時職位間的快速轉變。作者說，對於 70% 不在終身職晉升系統的教學人員來說，即便是繁重的、沒有保障的一年八堂課的課表，也只能帶來低收入的工資，而這只是書中「由經濟不安全感所引起或加劇的侮辱」令人震驚的例子之一。

作者寫道，研究生和博士後教師現在也成為廉價、過剩的勞動力。大學發現了如何把員工的抱負轉為金錢，他們培養出有紀律的學者，並使其在正式放棄學術生涯發展之前，盡可能長時間地忍受打零工。作者說，許多技術支持、食品服務和其他工人也受到了類似的虐待，這些職位已外包給通常嘲笑過去標準勞工保障措施的公司。

作者說，這些決策和許多其他的發展構成了學術界全面的「新自由主義」轉變，在這裡個人自由優先於公共利益。不受勞動保護的工作，在學術文化上被重新認定為自力更生的美德標誌。同時，一個學者的成功或失敗（例如學者靠研究經費生存的能力）被認為是「完全取決於個人投入的程度」，而沒有考慮「系統性的勞動和僱傭模式」。

凱澤聲明，這一切必須盡快改變。讓她對改革抱持樂觀態度的原因是，她看到許多力量正在集結，例如研究生和教職員工的工會化。她說，工會化或工會造成的威脅不太可能單獨贏得勝利。但她相信，當學生和家長的不滿、立法者的不安以及普通的道德勸說交織在一起時，工會化就能盛行且取勝。她說，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以影響行政決策者作出相對應的改變，進而減少他們的控制力，並反轉他們對自身地位的膨脹。

「我去過的每一個校園、每個州，我都聽到人們說，『我們無法採取任何行動來改善校園裡的勞動條件，因為那會增加學費。』而我會說，『不，不，不是這樣的。我們需要在現有預算範圍內重新分配資金。』」

凱澤說：「學生學習是改革最振奮人心的理由。」作為南加州普利亞斯高等教育中心(Southern California's Pullias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的聯合主任，她看到了這一點，在那裡，她是德爾菲計畫(Delphi Project)「改變教師和學生成就」的計畫負責人。該計畫集結了許多高等教育領域的代表，包括工會、政策制定者、學術紀律社團、教師團體、非終身職教師的倡議者和校園管理者，共同來研究 Gig Academy 書中探討的現象。凱澤說：「我們把這些團體聚集在一起，因為光靠任何一個團體無法做出目前所需的巨大改變。」

撰稿人譯稿人：Peter Monaghan / Yung-Tsen Chen

資料來源：2019年11月24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cademe as the Dystopian Workplace*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Academe-as-the-Dystopian/247597>